

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经济影响*

——基于明清商帮的实证研究

刘蓝予 周黎安 吴琦

摘要:本文利用明清时期县级层面的商帮数据,对以明清商帮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明清时期商帮活跃地区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这些传统商业文化浓厚的地区,居民创业更活跃、教育水平更高、社会交往更频繁、互助行为更多,非国有企业兴办更繁荣,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更为多元广泛、实收资本规模更大,传统商业文化通过个体、企业和行业3个层面的作用机制对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长期影响。本文首次利用详实数据,提供了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经济影响的系统证据,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奇迹的历史文化根基。

关键词:传统商业文化 商帮 非国有经济 创业行为 人力资本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1.0174

一、引言

中华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久深厚,成为后世发展“日用而不觉”的丰厚养料。中华先民数千年来的经济生产和商业贸易实践,积累形成了勇于开创、崇学重教、和衷共济、守信慕义、锐意进取的优秀传统商业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活动的历史,以及在历史实践中发展出的思想观念、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都会在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绩效上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传统商业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价值偏好、社群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在地域与族群中代际相传,绵延数百年,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类独特的非正式制度要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长期以来为理论界所重视,Stiglitz(2000)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发育尚未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尚未完备、正式制度尚未能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传统文化是经济赶超的助推器。韦森(2004)认为,文化氛围的差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获得成功,而同样采取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印度经济绩效却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所在。吴承明(2014)认为,传统文化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最高层次上的约束条件,决定着发展路径的适用性与实效性;另一方面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动力基础,是引导创新和变革的“启蒙”火种。厉以宁(2018)强调,“文化可能就是生产要素中未被列入但很可能今后会被列入的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生产要素的新的组成部门”。关于传统文化因素在我国经济的影响,也积累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例如考察地区宗教氛围与企业治理的关系、个体宗教信仰对创业选择的影响(陈冬华等,2013;阮荣平等,2014),儒家传统对公司代理效率的影响(古志辉,2015)、对居民创业倾向和民营经济活跃度的促进作用(Zhang,2020),科举文化对当代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Chen et al.,2020),以及方言差异对公司代理成本(戴亦一等,2016)、企业跨省经营活动(高超等,2019)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徐现祥等,2015)。

在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传统商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更直接的。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历史上的商帮、行会等经济组织,及其所演进出来的交易与生产形式,积累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制度环境、人力资本、职业观念和社会网络都发挥着长期作用,进而对经济绩效产生长期影响,成为一种独特且无形的“地域性资本”(Greif,2006;Camagni et al.,2009;Guiso et al.,2004,2015)。在我国历史上的商业实践中,演化出了海商、总商、牙商等多样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涌现出了晋商、徽商等实力雄厚的商帮组

*感谢北京大学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国家治理传统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7100603499)和北京大学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心的资助。周黎安为本文通讯作者。

织,发展出了儒而好贾、亦绅亦商的独特商业风貌。这些历史上的商业实践及其积累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是后世经济活动的文化土壤。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影响,呈现这种长期影响的表现形式,阐释其中的作用机理,对于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文化根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选取明清商帮的兴起和活跃作为传统商业文化的代理变量,结合基于方志资料整理的明清时期县级层面的商帮数据(吴琦等,2019)以及近、当代调查与统计资料,实证检验了传统商业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长期影响。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历史、地理信息等区域特征之后,传统商业文化深厚的县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更高。结合理论阐述与回归分析发现,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相比无商帮兴起的地区,居民创业活动更为积极;长时段内各个代际的个体教育水平更高;居民社会交往更频繁、互助行为更多,民营企业资本规模所反映的地区信任环境更好,总体表现为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积累;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兴办无显著差异,但社队企业的兴办更活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民营企业发展更为迅速。另外,在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民营企业在行业领域上表现出多元广泛的分布特征,这与明清商帮的多元经营传统是相一致的。这些实证证据表明,传统商业文化在居民创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兴办和行业传统这5个角度上,通过个体、企业和行业3个层面的作用机制长期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本文是国内外首次从商业组织活动史的角度利用个体和地区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传统商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当前研究传统文化长期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聚焦于历史上的社会资本(Guiso et al., 2004, 2015; Zhang, 2020)、奴隶贸易(Nunn & Wantchekon, 2011)、殖民(Banerjee & Iyer, 2005)、传教活动(Waldinger, 2017)和教育(Becker & Woessmann, 2009; Chen et al., 2020)等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支重要文献研究了历史上多种商业组织的文化理念、管理机制及其效率优势,如国际学者对地域性商人联盟(Greif, 2006)、学徒工场(Epstein, 1998)和手工业行会的研究(Hickson & Thompson, 1991; De la Croix et al., 2018),国内学者对明清商帮也进行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如张海鹏和张海瀛(1993)、范金民(2006)、蔡洪滨等(2008)、陈支平(2009),但所有这些研究均缺乏基于详实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采用回归分析方法,不仅发现了以明清商帮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产生长期经济影响的系统性证据,还揭示了其发生持续影响的渠道机制。

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历史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①。本文的发现为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坚定地树立“四个自信”,探索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提供了有意义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发现。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研究背景进行了介绍,基于现有文献对明清商帮、传统商业文化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第三部分报告了研究的数据来源、处理方法、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报告了模型设计与回归策略;第四部分报告了基础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报告了机制分析的结果;第六部分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第七部分报告了本文的总结与政策建议。

二、明清商帮、传统商业文化与当代经济发展

商帮,是以地缘和血缘为认同基础,以亲情和乡谊为情感纽带,以“相亲互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义庄、祠庙等为活动场所的一种自发型、半正式、地域性的商业组织,是儒家传统结合企业家精神的一种表达形态。我国商业活动的历史久远,上古先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开展了最早的商业实践。秦汉至宋元,行商坐贾的经营行业逐步细分,商业组织在商人自发与朝廷管理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到了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快速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商帮相继兴起并逐步发展成为明清两代直至近代中国经济舞台上最为活跃、最受瞩目也最具实力的商贸活动单位。“十大商帮”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张海瀛、张海鹏,1993)。在近代以来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中,

大部分明清商帮相继渐衰落,“宁波帮”、“闽帮”等以适应变革的组织形态、灵活多元的经营方式在我国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企业家群体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莆田帮”“温州帮”等在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活跃起来,成为中国大陆乃至全球商界中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受到学术界与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明清商帮的活跃时期长、地域分布广、经营规模大、涉及行业多,在经营理念、治理模式和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经验,为后世的经济的发展提供着丰沛充裕的文化养分。

在商业史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研究中,傅衣凌(1956)开展了奠基性的工作,从扎实丰富的史料中对明清时期商业活动的主要特征,商业风貌的基本形态,代表性商业组织的形成过程、活动范围、经营方式以及治理传统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强调以东南海商在海洋贸易中形成的开放外向的“中国海洋文化”对保守内敛的传统农耕文化具有重要的拓展和补充意义。此后的经济史学家们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社会影响展开了丰富的论述(范金民,1999,2006;陈支平,2009)。近年来,随着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史领域的应用,对传统商业文化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一些成果。邵传林和金立民(2015)以民国时期知名企业家人数作为传统商业文化的代理变量,发现其助推了各省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叶德珠和师树兴(2016)基于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二者互为替代关系的假设,以耕地稀缺程度作为商业文化的代理变量,检验了其对各省经济增长速率的积极影响;赵子乐和林建浩(2019)以福佬族群方言作为海洋文化的标志,发现在广东省内,以广府族群为基准,地处海洋文化深厚的福佬族群聚集区的企业创新投入有着明显的提高,反之,位于海洋文化薄弱的客家族群聚集区的企业创新投入则显著降低。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明清商帮兴起和活跃的历史作为一个地区传统商业文化的代理变量,对其所产生的长期经济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在居民创业的角度上,商业繁荣会提升区域内居民对商业活动的认可程度,对商业的“先天亲近”会通过家庭教育、社群氛围和文化标识代际相传,形成对创业活动的长效促进(Amin,1999;Guiso et al.,2008)。明清商帮的活跃在当时引发了“竞以求富为务”“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的价值观念转变,孕育了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提倡“四民皆本”的学术思潮,也形成了以开放外向的“中国海洋文化”(陈学文,2011;赵子乐、林建浩,2019)。例如,清宣统时期《山西风土志》记载,“人性视商业较儒业为优,故全省人民之职业,农之外,商为多……如太(原)、汾(阳)、平(遥)、蒲(州)、解(县)、(新)绛等处,以经商为天职……”(张正明,2016)。回顾改革开放史也不难发现,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双重条件下,安徽、浙江、江苏等历史上大型商帮活跃、传统商业文化深厚的地区,在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探索和乡镇企业崛起等领域中往往能率先突破,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在人力资本的角度上,传统商业文化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形成长期存续的人力资本优势。以明清商帮为例,对内部成员来说,商帮的经济活动既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需求,激发了更强的人力资本积累意愿,又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条件(张明富,2002)。一方面,商业活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促使商帮兴起的地区形成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例如,在明清商帮的主营项目中,典当、钱庄等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簿记与算数的能力,长途贸易、商情交流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好的书写和文字表达能力,官盐贩卖、军需采买等需要密切联系官府的事务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好的儒学素养、沟通能力和礼仪知识。这些人力资本需求参照当时的平均教育程度来看已经是很高水平。而识字率、计算能力和日常阅读写作频率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Becker & Woessmann,2009)。另一方面,明清商帮为兴办教育提供了经济支撑(范金民,1999)。兴办族学、祠塾和庄校等教育机构,不仅满足了明清商人群体“光耀门楣”“德被子孙”等自发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契合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有助于商人群体进一步获得社会认同。同时,这些机构还为商帮承担着培养子弟、选拔人才等更富现实意义的功能。在自我价值取向、社会价值认同和现实功能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兴办教育在明清商人群体中蔚然成风(冯尔康,2009;陈勇、李学如,2011)。地域性商人团体也推动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探索,支持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李加林、姜忆湄,2016)。

在社会资本的角度上,传统商业文化通过信息渠道的拓展、社群内部公共服务的改善、信任环境的优

化,促进社会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繁荣。第一,浓厚的传统商业文化、活跃的商业组织活动史,增加了个体间社交网络的关联强度,形成了非正式的商业资讯交流场域,为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扩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马格里布商人联盟、欧洲手工业行会以及我国近代的鹤庆、喜洲等商帮都在新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新管理模式的引入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Epstein, 1998; 罗杨焱, 2019)。第二,传统商业文化注重诚信,历史上晋商对机会主义行为所实施的多边惩罚机制、徽商定期编纂发行“征信录”的传统以及洞庭商帮的职员保荐制度,都对当地诚信文化的建构和信任环境的改善有着积极作用(蔡洪滨等, 2008; 王振忠, 2019),这种信任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企业形成更大的资本规模、更有效地扩充实力(Fukuyama & Francis, 1995; Beugelsdijk et al., 2005)。第三,传统商业文化鼓励合作,商贸活动拓展了传统小农经济中分工合作的家庭边界。和衷共济的价值理念,历史上的合股集资的经营模式以及殡舍、义冢、医治寄宿所等商团组织内部公共服务模式的探索,能拓展资金、信息和社会关系渠道,发展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引导区域内更加活跃的商业合作(吴慧, 1999; Greif, 2006)。

在企业兴办的角度上,传统商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为企业兴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基础。第一,传统商业文化对商业活动的认可与倾向,不仅在居民创业的角度上影响企业的创办者,同时也会在社会观念的角度上影响企业员工、潜在就业者以及企业外部的监管者等多元群体,这样的社会价值认同,可以为企业兴办提供更好的文化环境(蔡莉、单标安, 2013)。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在商业传统深厚的浙中地区,义乌小商品市场具有开拓意义的建设与成功,就是在从业者、消费者和以谢高华为代表的一批地方领导对商贸活动的高度认同、积极推动和共同努力下实现的。第二,传统商业文化对居民创业的鼓励,为企业兴办提供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头人(邵传林, 2016);对人力资本的提高,为企业兴办提供了更好的员工素质基础;对社会资本积累的促进,为企业兴办拓宽了信息和资金来源渠道,为企业兴办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条件(Nuun & Wantchekon, 2011)。

在行业传统的角度上,传统商业文化中开拓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会鼓励企业在更多元的行业领域探索尝试;传统商业文化中和衷共济、相亲相助的价值追求会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为企业涉足更多行业领域提供支持。多元经营是我国商业史上常见的行业传统。在企业家精神的主观推动,以及风险分担和资源配置的客观需求下,我国明清的商业组织都呈现出行业领域多元化的经营特点。小到一个商业家族,大到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的同乡同业组织,再大到举世闻名的大型商帮,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例如,民间商业文书记载,明清时期的闽商家族往往是宗族亲属之间分业经营,但资本合作来往密切(陈支平, 2009);上海知名的同乡同业组织点春堂,由糖业起步,逐渐成为在棉、糖、海产行业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近代商团(高红霞, 2006);明代晋商“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从而以山西为本据,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之间,构成有机的商业联系”(傅衣凌, 1956)。这种多元经营的特点,在当代的地域性商业组织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业务覆盖了行业链条各个环节的西宁二手车商帮、莆田石油和医疗帮等(骆桂花、肖明远, 2018; 徐德金, 201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②。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既体现在主观的思想角度上,也体现在客观的行为角度上,既作用在个人这个最小的行为主体单元上,也作用在企业、商团等组织上,最终加总表现在宏观视角下的经济发展绩效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优秀传统商业文化为当代经济活动提供了更积极的居民创业热情、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更深厚的社会资本基础,为企业兴办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条件,商业史上所形成的多元经营、广泛涉猎、协同合作的行业传统也传承至今。基于历史实践所形成的优秀传统商业文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独特文化土壤。基于前文的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本文认为,以明清商帮的兴起和活跃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会推动当代的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居民创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兴办和行业传统5个角度,在个体、企业和行业3个层面上的作用机制上产生全面、系统、深刻的长期影响,接下来将对这个观点进行实证检验。

三、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与回归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地区历史上是否有明清商帮的兴起和活跃,参考此前文献的理论观点和数据处理方法(吴慧,1999;范金民,2006;吴琦等,2019),将明清商帮的二值变量定义为:1368(明洪武元年)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该县的商人群体在其所属府级辖区以外建立了商业会馆,或在方志资料中有经商风气浓厚、商贸活动繁盛和商团组织活跃等相关描述^③。数据基于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何炳棣主编《中国会馆史论》、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馆志》、日本经济学会编《中国经济全书》第5册,以及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手工整理获得。

基础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包括:人均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等,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指标来源于1997年至2013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包括:历史人口密度,基于曹树基所著《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提供的1680年分府人口数据估算获得;科举数据,来源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宗族发达程度,来源于《中国家谱总目》;地区历史治理特征,基于《清史稿·地理志》中对各县“冲、繁、疲、难”的评定对4个哑变量赋值;各县到海岸线的最近距离、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由基于地理信息网络数据库的手工计算获得^④;当代是否为对外开放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地区,基于相关政策文件获得。对于历史数据所对应的行政区划的古今差异,通过行政辖区重叠面积占比加权的方法来实现匹配。

机制检验的数据来源报告如下:对居民创业的机制检验,被解释变量为受访者是否从事自主创业,控制变量除历史人口和地理信息外,还包括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民族和性别,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对人力资本的机制检验,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农村居民识字水平,在时间上覆盖了20世纪10年代至70年代,以每10年为一个阶段,共7个时期出生的居民样本,控制变量除历史人口、地理信息外,还包括受访者的一些基本信息,数据来源于1982年人口普查。对社会资本的机制检验,个体层面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每周参与社交活动的时间、与他人的互助行为,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的成人问卷;企业层面的被解释变量为民营企业平均实收资本规模,数据来源于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对企业兴办的机制检验,被解释变量为各县逐年度新成立的企业数量,基于普查数据中的企业成立信息在地域和年度上加总计算获得,涵盖了1950~1995年“乡镇、集体、国有”企业分类口径下的企业成立信息,以及1950~2008年“民营、外资、国有”企业分类口径下的信息,数据来源于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和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对行业传统的机制检验,被解释变量为行业领域分布特征,由各县、各行业领域的民营企业经营信息计算获得,数据来源于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

(二)描述性统计

样本涵盖的地区主要为明代“两京十二省”,由于明清两代边疆地区^⑤与内地在人口规模、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社会形态上的明显差异以及历史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样本不包括当前我国部分省级行政区^⑥。为保证样本之间的可比性,数据中剔除了当代市辖区样本^⑦。对于明清与当代区划属性都是市辖区的地区来说,这些地区是商帮活动的目的地、集散地而非发源地,现有史料无法清晰界定明清时期是否有商帮兴起和活跃。对于明清时期区划属性为县(散州),当代行政区划属性为市辖区的地区,近代以来的通商开埠、铁路建设、资源发掘、人口迁徙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在目前的数据条件下难以量化表征并纳入模型,实证结果会产生较大偏差。经上述处理,数据样本对应1990年行政区划方案中的1444个当代县。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中28.9%的县有商帮兴起和活跃的历史。

(三)模型设计与回归策略

基础回归模型设定如式1所报告。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一个地区明清时期是否有商帮兴起和活跃 *guild*,以此作为传统商业文化深厚的代理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当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con*。其中,控制变量为历史人口密度 *den*、“冲、繁、疲、难”^⑧4个方面所度量的历史上的治理环境 \overline{gov} ;表述地区地理特征的 \overline{geo} ,包括

到海岸线最近距离、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表述当代区域特征的变量 \overline{charac} , 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对外开放政策适用地区。同时,对省层面的地区固定效应、年份的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econ = \beta_1 \times \overline{guild} + \beta_2 \times \overline{den} + \beta_3 \times \overline{gov} + \beta_4 \times \overline{geo} + \beta_5 \times \overline{charac} + \mu_{pro} + \mu_t + \varepsilon \quad (1)$$

当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及随之产生的内生性担忧,在基础回归中同时采用了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两种回归策略,选取地区明清时期每万人家谱数和每万人进士数作为工具变量。首先,地区历史上地方宗族组织和科举的发达程度都是促使当地商帮兴起和活跃的显著影响因素(吴琦等,2019),宗族组织为商业活动提供着启动资金和可靠人手的来源,科举环境促进着大规模商业活动所必需的识字、算术和簿记等知识在当地的传播。其次,明清时期的宗族组织经过近代以来社会变革,特别是在“四清”运动和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活动中被完全破坏;科举制度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这两个变量对当代经济活动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影响。因此,选取这两个指标作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⑨。

四、基础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长期影响的基础回归结果,其中第(1)~(4)列为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第(5)~(8)列为工具变量两阶段模型(2SLS)回归结果,在每类回归策略中均依次报告了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增加控制省份地区的固定效应、增加控制年度的时间固定效应的结果。以第(8)列回归结果为例,明清商帮兴起和活跃的县,当代人均GDP(对数)提高0.571个单位,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表现出积极的长期影响。

进一步地,选取当代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就业结构的特征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样本中,这些变量有些统计连续性较好,也有些仅涵盖个别年份的观测信息^⑩,因此选取各年份的平均值并进行了对数标准化处理。回归策略为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工具变量回归。表3所报告的回归结果可以说明,历史上有明清商帮兴起和活跃的地区,从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历史数据					
明清商帮	1444	0.289	0.453	0	1
每万人家谱数	1444	0.116	1.585	0	48.617
每万人进士数	1444	11.645	85.376	0	1948.29
人口密度(1680年)	1444	1.303	3.456	0.000876	85.945
“冲”	1444	0.404	0.491	0	1
“繁”	1444	0.506	0.500	0	1
“疲”	1444	0.211	0.408	0	1
“难”	1444	0.450	0.500	0	1
地理数据					
到海岸线最近距离(km)	1444	433.092	341.034	0	1323.457
平均海拔(km)	1444	0.509	0.594	0.000233	3.667
平均坡度	1444	2.267	2.124	0.0130	13.856
当代地区特征					
少数民族地区	1444	0.0551	0.228	0	1
对外开放地区	1444	0.121	0.326	0	1
当代经济发展(1997~2013年)					
人均GDP(万元)	21161	1.316	1.652	0.0461	38.934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万元)	21390	0.681	1.073	0.00602	22.548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万元)	21052	0.415	0.577	0.00176	16.045
每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17666	1.812292	2.513061	0.0222	42.517
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万元)	17665	20581.97	43659.52	0.000476	108.764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1242	0.135	0.105	0.000412	1.021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1241	0.136	0.751	0.00128	0.503

注:*由于数据样本中不含各县常住人口数据,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由当年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户籍人口数”计算获得,因此在工业发达、外来打工人员较多的地区,会出现该占比数值大于1的情况。

表2 基础回归结果

回归策略	(1)	(2)	(3)	(4)	(5)	(6)	(7)	(8)
	最小二乘法				工具变量			
变量名	人均GDP(对数)							
明清商帮	0.319*** (0.0412)	0.0933*** (0.0345)	0.153*** (0.0321)	0.156*** (0.0323)	-0.0690 (0.189)	0.462*** (0.139)	0.563*** (0.156)	0.571*** (0.157)
人口密度		0.0379*** (0.0134)	0.0384*** (0.0106)	0.0374*** (0.0118)		0.122*** (0.0437)	0.143*** (0.0449)	0.146*** (0.0445)
“冲”		0.134*** (0.0309)	0.146*** (0.0281)	0.152*** (0.0283)		0.115*** (0.0332)	0.132*** (0.0303)	0.138*** (0.0305)
“繁”		0.0369 (0.0333)	0.0254 (0.0294)	0.0273 (0.0296)		0.00670 (0.0363)	-0.0106 (0.0336)	-0.00978 (0.0338)
“疲”		-0.0928** (0.0396)	-0.00373 (0.0354)	-0.00261 (0.0357)		-0.0975** (0.0406)	-0.00109 (0.0383)	-0.000375 (0.0386)
“难”		-0.0905*** (0.0304)	-0.0691** (0.0274)	-0.0669** (0.0275)		-0.117*** (0.0341)	-0.0928*** (0.0310)	-0.0910*** (0.0313)
平均坡度		0.0104 (0.0111)	-0.0326*** (0.0122)	-0.0330*** (0.0122)		0.00429 (0.0118)	-0.0373*** (0.0127)	-0.0375*** (0.0128)
海岸线距离		-0.155*** (0.0127)	-0.0853*** (0.0161)	-0.0880*** (0.0159)		-0.131*** (0.0150)	-0.0646*** (0.0180)	-0.0668*** (0.0178)
平均海拔		-0.279*** (0.0782)	0.274** (0.129)	0.276** (0.129)		-0.237*** (0.0811)	0.333** (0.137)	0.336** (0.137)
民族自治地区		-0.250*** (0.0449)	-0.200*** (0.0560)	-0.206*** (0.0562)		-0.156*** (0.0575)	-0.150** (0.0604)	-0.158*** (0.0606)
对外开放地区		-0.330*** (0.0861)	-0.172* (0.0907)	-0.186** (0.0900)		-0.324*** (0.0853)	-0.207** (0.0915)	-0.220** (0.0909)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21161	21144	21144	21144	21161	21144	21144	21144
R ²	0.024	0.153	0.212	0.713	-	0.124	0.180	0.680

注:表中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产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上看二、三产业发展更好,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就业结构所表征的当代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更高,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五、机制分析

(一)居民创业

传统商业文化的当代传导路径虽然难以完备地量化描述,但可以通过商业活动史与当代个体、企业和行业层面上的经济特征之间的关联来检验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首先,以个体作为观测点,考察传统商业文化在居民创业角度上的作用。一个地区居民从事自主创业的活跃程度,是行为主体在不同就业选择之间“用脚投票”的总体结果,可以有效地反映当代居民价值倾向和地区商业氛围,体现传统商业文化“勇于开创”的基本内涵。参考Zhang(2020)的方法,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20%再抽样数据为基础,对商帮在地区居民创业选择中的影响进行考察。将调查问卷中“上周工作的单位或工作类型”及“就业身份”两个问题的答案为“私营企业雇主”或“自营劳动者”的个体定义为自主创业者,通过最小二乘法和Logit回归考察商帮对居民个体自主创业行为的影响。以表4第(4)~(6)列的Logit回归结果为例,在控制了地区特征和性别、民族、教育等个人特征以及省一级的地区固定效应后^①,历史上有商帮兴起的县当地居民自主创业的概率提高0.637%,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选择以私营企业雇主为职业的概率提高0.0587%,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选择以自营劳动者为职业的概率提高0.577%,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历史上的商业繁荣、商帮组织活跃,所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鼓励着当代居民的创业行为。

(二)人力资本

其次,检验传统商业文化在当代居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上的作用机制。以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为样本。从受访对象年龄分布来看,样本涵盖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3个不同历史阶段内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居民,能够较好地反应传统商业文化在近百年的历史跨度中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对受访人按出生年代进行了分组。回归结果说明,在控制了地区历史、地理特征,受访者性别、民族、年龄以及地区固定效应后,明清商帮兴起地区的居民在各个出生年代组别均表现出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传统商业文化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积极的长期影响,在各出生时段,这种影响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6报告了在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农业户口受访者是否识字^②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以此来检验传统商业文化在较少受到近代以来城市建设影响的农村地区对居民基本知识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说明,有

表3 商帮历史对地区当代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长期影响

	(1)	(2)	(3)	(4)	(5)	(6)
变量名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明清商帮	0.802** (0.347)	0.337*** (0.129)	1.327*** (0.444)	0.127*** (0.298)	0.399*** (0.116)	0.0835** (0.2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1285	1282	1282	1241	1285	1240

注:绝对数值的因变量均进行了对数标准化处理,表中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4 传统商业文化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

	(1)	(2)	(3)	(4)	(5)	(6)
变量名	私营企业雇主	自营劳动者	自主创业	私营企业雇主	自营劳动者	自主创业
明清商帮	0.000589*** (0.000198)	0.00590** (0.00290)	0.00649*** (0.00294)	0.000587*** (0.000177)	0.00577** (0.00275)	0.00637** (0.002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1139859	1139859	1139859	1139859	1139859	1139859

注:表中1~3列的回归策略为最小二乘回归;第4~6列为Logit回归,报告了估计结果的平均边际值。表中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5 传统商业文化对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1)	(2)	(3)	(4)	(5)	(6)	(7)
出生年代分组	20世纪 10年代	20世纪 20年代	20世纪 30年代	20世纪 40年代	20世纪 50年代	20世纪 60年代	20世纪 70年代
变量名	受教育水平						
明清商帮	0.0318*** (0.00747)	0.0407*** (0.00987)	0.0566*** (0.0140)	0.0658*** (0.0155)	0.0814*** (0.0199)	0.0572*** (0.00159)	0.0354*** (0.008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145462	229769	295691	376002	533459	770361	513936

注:回归策略为最小二乘回归。表中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明清商帮兴起的县,农村人口识字率显著提高,从20世纪1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各代际人群的识字概率均提高20%以上,且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上述机制分析结果体现了传统商业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居民人力资本的持续影响,传统商业文化中“崇学重教”的价值追求在商帮兴起、商业繁荣的地区世代相传。常见于明清和民国史料中对商业繁荣地区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的记载^⑩,在全国样本的范围上得到了验证。

(三)社会资本

下面,本文考察传统商业文化对地区信任环境改善和社会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历史上的商业繁荣,通过经济合作,拓展了人际关系网络,突破了传统小农经济中交往、合作与互助的家庭边界。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成人问卷数据,对传统商业文化的这种影响机制进行考察。利用调查问卷中“您每周周末有多少时间用于社会交往(小时/周)”的回答,对居民社交活跃程度进行刻画。将问卷中受访者上一年是否在“子女上学”“看病”“自己找工作”“子女找工作”事项上获得了他人的帮助,对互助行为进行刻画。为了厘清互助行为是通过社交纽带发生,而不是依托血缘亲情实现,进而通过互助行为来有效地反映地区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对“他人”做了进一步的界定:在“帮助您的人和您是什么关系”问题中,回答为“亲属”“邻居”“一般同事”“朋友”的情况,而不包含帮助对象为“父母”“兄弟姐妹”“岳父母、公婆”“直系祖辈”等情况。表7报告的回归结果说明,在控制了受访者性别、年龄、民族、收入、婚姻、健康和教育情况,以及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特征之后^⑪,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居民每周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有所提高,影响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居民更多地获得来自家庭以外的帮助,这种影响在“子女上学”“看病”“自己找工作”的求助事项中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对“子女找工作”获得帮助的估计系数也为正,但不显著。总体来看,传统商业文化在当代居民个体的社会行为中,呈现出一种社交活跃、互信互助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一个地区信任环境和社会资本的特征,不仅在居民个体层面,还应在企业层面有所体现。接下来,从民营企业平均实收资本规模的角度,对传统商业文化与当代地区信任环境、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检验。Fukuyama和Francis(1995)提出,一个地区总体上的合作氛围、信任环境与社会资本积累水平,会直接地反映在企业规模上。企业规模越大,说明经营过程中的各类合作越广泛,也间接说明地区合作氛围越浓、信任环境越好、社会资本积累水平越高。基于2008年经济普查的企业层面数据,计算了当代各“县—行业门类”民营企业的平均规模。表7第(6)列报告的回归结果说明,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以实收资本总计来度量的民营企业规模更大,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房地产业、采矿业和金融业中。这4类行业都是起步门槛较高、资金需求较大的行业,同时也是对地区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比较突出的行业。商帮兴起地区民营企业总体资本规模的提高,体现了传统商业文化在当代民营企业资本合作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综合上述两个角度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传统商业文化促进了当代区域信任环境改善与社会资本积累,在个体行为、企业特征上均有所体现。

(四)企业兴办

接下来,本文考察传统商业文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地区企业创办活动的关系。企业的兴办与创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活动基础,特别是非

表6 传统商业文化对乡村居民是否识字的影响

	(1)	(2)	(3)	(4)	(5)	(6)	(7)
出生年代分组	20世纪 10年代	20世纪 20年代	20世纪 30年代	20世纪 40年代	20世纪 50年代	20世纪 60年代	20世纪 70年代
变量名	农业户口受访者是否识字						
明清商帮	0.229*** (0.0563)	0.217*** (0.0551)	0.210*** (0.0527)	0.267*** (0.0599)	0.300*** (0.0712)	0.271*** (0.0752)	0.247*** (0.0606)
控制变量	控制						
省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样本	141781	223144	285273	362753	514264	747792	500859

注:回归策略为Logit回归,报告了平均边际值。表中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7 传统商业文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1)	(2)	(3)	(4)	(5)	(6)
变量名	社会交往时间 (小时/周)	获得他人帮助 (子女上学)	获得他人帮助 (看病)	获得他人帮助 (自己找工作)	获得他人帮助 (子女找工作)	民营企业实收资本 规模(对数)
明清商帮	0.419* (0.247)	0.398** (0.173)	0.343** (0.165)	0.287** (0.143)	0.197 (0.218)	0.0748** (0.03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	-	-	-	-	控制
观测样本	16024	16020	16020	16020	16020	18658

注:回归策略为最小二乘回归,表中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国有企业兴办的繁荣程度是传统商业文化中“勇于开创”“锐意进取”的一种体现,可以直接反映传统商业文化在当代的民间传承。基于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通过事件研究法对明清商帮在当代各时期(以每2年作为一个时间单位)对企业兴办的长期影响进行考察。附录中表A报告了回归结果,以同时考虑了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交互项的第(3)、(4)列回归结果为例,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地区企业兴办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的兴办上表现的更明显。

图1报告了估计系数及95%置信区间的分布情况,描述了影响的时间趋势。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商帮兴起地区与非商帮兴起地区相比,在国有企业的创办上没有显著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传统商业文化主要在民间发生影响,体现为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把握和灵活反应,而国有企业创办是各级政府基于国家计划而决定的,独立于该地区的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在1992年以后的各时期,商帮兴起和活跃的历史对非国有企业兴办影响逐年上升,其估计系数是国有企业兴办影响的估计系数的10~100余倍,且显著性更高。1992年以“南方谈话”为标志,市场经济改革进入快车道,企业家精神和传统商业文化重新焕发出旺盛生机,激发起强大的经济动能。这说明,传统商业文化对于当代民间商业的繁荣活跃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积极影响只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才会逐步体现出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证结果相当于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分析框架下的“平行趋势”检验,也是识别传统商业文化影响的一种“安慰剂”检验。我们认为,图1提供的结果为验证传统商业文化对民间企业家精神的长期影响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证据。

图2报告了将数据样本调整为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后,传统商业文化对企业兴办影响的回归结果。相比图1使用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使用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虽然覆盖时期更短,但能够更好地反映了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大规模乡镇企业改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也未开始,因此1995年的数据也更好地反映了国企兴办的情况。图2的分析结果与图1相比总体上一致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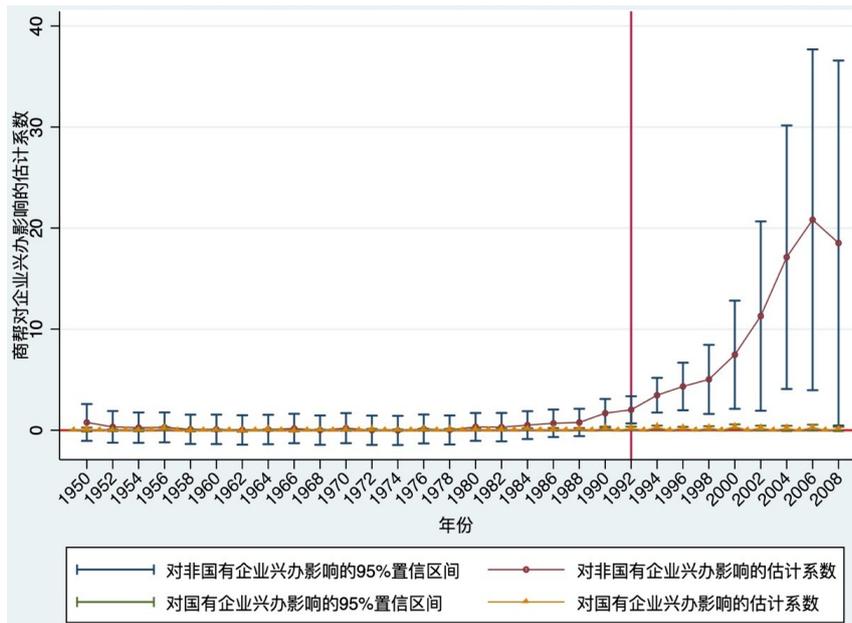


图1 传统商业文化对地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兴办的影响(2008年经济普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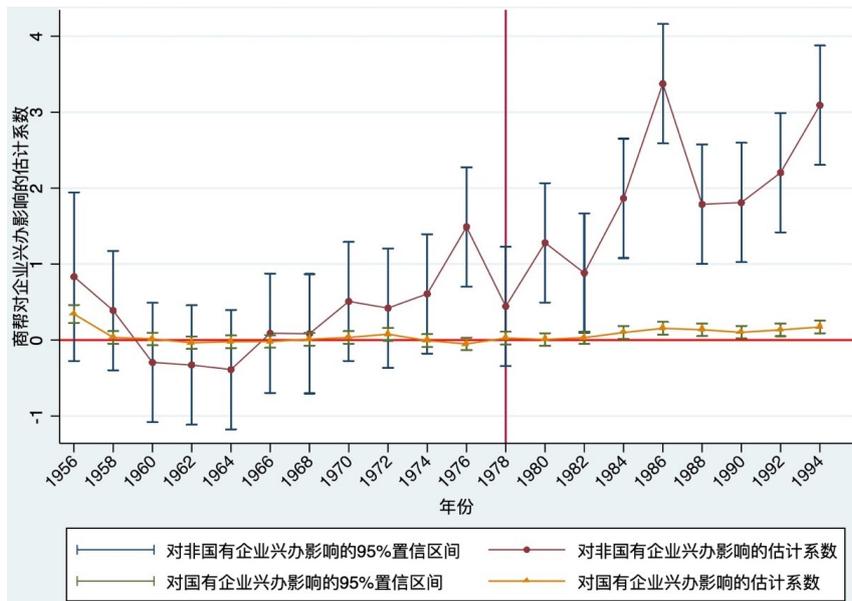


图2 传统商业文化对地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兴办的影响(1995年工业普查)

创办在商帮兴起地区和非商帮兴起地区相差不大(1956年的跳跃可能反映了商帮兴起地区解放前私企相对较多,“公私合营”之后国企数目突然增加),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非国有企业创办在两类地区差距明显。事实上,商帮兴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创办数量的优势在1970年之后就显现出来了。我们的解释是,1970年中央鼓励农村发展“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数据表明商帮兴起地区的反应比非商帮地区更为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社队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计划之外,完全依靠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分析结果表明,传统商业文化对于农村兴办“社队企业”也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四)行业传统

最后,本文考察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民营经济行业传统的影响。商帮兴起和活跃的历史,不仅形成了积极兴办企业的商业文化,也积累了深厚的行业传统。商帮作为一种地域性、自发型、非正式的商业组织,在历史上的商业实践中对组织内部成员在经营领域的分布上发挥着非正式的管理、分配和引导作用^⑤。针对民营企业企业家群体的案例研究也说明,当代温商在经营方式上有着“扎堆”“抱团”的特征,赣商有着“人行雁阵”的协同文化(辜胜阻等,2006;贺三宝,2014)。这种行业传统在当代全国视野下的民营企业中又是如何表现的?本节对这一问题进行检验。

基于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对传统商业文化与当代民营企业行业分布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参考茅锐(2015)的方法,基于企业营业收入数据,计算了各地区民营企业在各行业门类^⑥中子领域^⑦的赫芬达尔指数^⑧,对民营企业的行业领域集中度进行测算。表8所报告的回归结果说明^⑨,有明清商帮兴起历史的县,反映民营企业在各大行业门类内部的子领域中集中程度的赫芬达尔指数总体上降低0.0159,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分组回归结果说明,这种影响在制造业等6个行业门类中作用显著。这说明,传统商业文化提高了民营企业向各个行业领域拓展业务的积极性,促使行业门类内部各子领域的方向上都呈现出“齐头并进”的繁荣局面。历史上,明清商帮“钻天”“遍地”的业务开拓和地理遍及,在当代也表现在行业领域的开拓与遍及上。强调自主探索、勇于尝试、锐意进取的传统商业文化,鼓励着当代民营企业向各个行业领域水银泻地般地全面渗透,在地域层面上形成了多元经营、广泛渗透的行业分布特征。

综合行业分布、社会资本这两部分机制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传统商业文化促使当代民营企业的行业领域分布更多元、资本规模更大。从地域视角来看,“扎堆”和“抱团”更多地表现在合作的促进、企业资本规模的提升上,而并非行业领域的集中堆叠、经营内容的简单重复。当然,传统商业文化对民营企业合作的促进,可能不仅发生在资本合作上,还包括技术、信息和管理上的合作,但由于数据的局限,传统商业文化对这些类型合作的引导作用目前还难以实证检验。

六、稳健性检验

通过调整数据样本、回归策略和因变量的方法对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稳健性检验,表9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同时考虑了明清商帮、识字率及二者交互项,对明清商帮这一代理变量在传统商业文化之外可能还蕴含的历史教育特征进行控制^⑩;第(2)列将有无明清商帮兴起的县按同一省内、人口规模相近的原则进行了手工匹配,调整了数据样本规模;第(3)~(5)列分别将回归策略调整为工具变量广义距估计(GMM)、工具变量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LIML)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PSM)的方法;第(6)、(7)列将被解释变量调整为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储蓄余额(对数);第(8)~(11)列将因变量的时期进行了调整,选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⑪数据,检验传统商业文化对

表8 传统商业文化对地区民营企业在各子领域集中度的影响

	(1)	(2)	(3)	(4)	(5)	(6)	(7)
行业门类	全行业	制造业	商服租赁业	批发零售业	文体娱乐业	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业	能源生产供应业
变量名	行业集中度						
明清商帮	-0.0159*** (0.00387)	-0.0223** (0.0111)	-0.0266* (0.0144)	-0.0231** (0.00968)	-0.0586*** (0.0186)	-0.0432** (0.0204)	-0.0315** (0.01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18660	1285	1256	1297	727	1016	1187

注:回归策略为最小二乘回归。表中报告了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9 基础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数据样本	1997~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1933《中国工业调查报告》			
回归策略	2SLS	2SLS	GMM	LMLE	PSM	2SLS	2SLS	OLS	OLS	OLS	OLS
变量名	人均GDP					人均财政收入		人均储蓄余额			
明清商帮	3.39** (1.538)	0.427*** (0.119)	0.200*** (0.0648)	0.229*** (0.0563)	0.217*** (0.0551)	0.210*** (0.0527)	0.267*** (0.0599)	461.4*** (172.7)	22813** (10842)	1762** (769.0)	6687** (2895)
识字率	3.133*** (0.420)	-	-	-	-	-	-	-	-	-	-
商帮×识字率	-4.961** (2.226)	-	-	-	-	-	-	-	-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观测样本	12128	12899	21144	21144	20934	21380	21332	82	82	82	82

注:(1)~(7)列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8)~(11)列数据规模较小,未报告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近代城市工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基础回归的主要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明清商帮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稳健的积极长期影响。

表10报告了居民创业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第(1)、(3)列分别将地区居民自主创业影响因素的回归策略调整为Probit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结果依然稳健;第(2)列考虑因模型缺陷而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以当地明清时期宗族和科举发达程度做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Probit回归策略,回归系数符合预期,但显著性不足^②;第(4)列将数据样本调整为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成人问卷数据,将对于职业状态的问题“您现在主要是在哪个机构工作”答案为“自己经营”的情况定义为自主创业;Probit回归的结果符合预期且在1%水平上显著。第(4)列回归因匹配的县级数目有限而未使用工具变量回归。

表10 居民创业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	(1)	(2)	(3)	(4)
数据样本	2005人口普查			CFPS2010
回归策略	Probit	ivProbit	PSM	Probit
明清商帮	0.00632** (0.00283)	0.0590 (0.109)	0.0188*** (0.000500)	2.187*** (0.6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1139859	1139859	1117709	8446

注: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11报告了人力资本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第(1)、(3)列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对内生性进行处理;第(2)、(4)列将回归策略调整为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第(5)、(6)列调整了数据样本,换用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并将有无明清商帮兴起的县按同一省内、当代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原则进行了手工匹配,调整了样本规模。其中,分别对受访者教育水平和是否高于最低教育水平(在问卷中最低教育水平的问题答案为“初中及以下”)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

表11 人力资本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	(1)	(2)	(3)	(4)	(5)	(6)
数据样本	1982人口普查			2005人口普查再匹配数据		
回归策略	2SLS	PSM	ivProbit	PSM	OLS	Probit
明清商帮	0.378*** (0.0653)	0.105*** (0.0232)	0.619*** (0.0922)	0.206*** (0.0407)	0.0269** (0.0106)	0.0627*** (0.02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2845527	710868	2936162	677570	621637	621588

注: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12报告了社会资本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第(1)列将因变量调整为受访者工作日和周末社交时间的和,(2)~(5)列将回归策略调整为Probit回归;(6)、(7)列将对传统商业文化与民营企业规模关系的回归策略调整为工具变量两阶段、广义距估计,第(8)列采用倾向匹配得分估计。

表12 社会资本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	(1)	(2)	(3)	(4)	(5)	(6)	(7)	(8)
数据样本	CFPS2010					2008经济普查		
回归策略	OLS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2SLS	GMM	PSM
明清商帮	0.241 (0.178)	0.180** (0.0782)	0.181** (0.0835)	0.136** (0.0702)	0.0837 (0.0855)	0.298* (0.171)	0.299* (0.177)	0.0873* (0.04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16024	16020	16020	16020	16020	18658	18658	8983

注: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Probit回归报告了平均边际值。

表13报告了行业传统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第(1)、(2)列将回归策略调整为工具变量两阶段、广义距估计,第(3)列调整为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第(4)~(6)列将因变量调整为基于民

营企业资产总计计算获得的赫芬达尔指数。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说明,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是稳健的。

七、总结与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的经济实践积累形成了勇于开创、崇学重教、守信慕义、和衷共济、锐意进取的传统商业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长期影响。本文结合明清商帮的历史数据与近当代经济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发现,传统商业文化深厚的地区当代经济发展绩效、第二与第三产业规模都显著高于平均水平。传统商业文化在个体、企业和行业3个层面上,促使居民创业活跃、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社会资本水平提升、非国有企业兴办繁荣、民营企业经营领域更全面多元,形成了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5个角度上的作用机制。以明清商帮为代表的历史经济实践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经济发展,传统商业文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动力与深厚根基。

本文作为实证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经济影响的首次探索,为认识我国经济的古今联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呈现了一些基于详实数据和严谨分析的经验发现。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增长奇迹”背后,文化根基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源,优秀传统文化是理解中国经济历史逻辑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包括孔孟程朱等形成于学理建构基础上的文化组分、诗词歌赋等形成于艺术创作基础上的文化组分,而且还包括传统商业文化等形成于千百年来经济实践中的文化组分。坚定“四个自信”,深入理解“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本文的实证分析对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组分,推动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学术研究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诚然,局限于作者的学术水平与数据可得性,本文还只是对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一次初步的尝试。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上有着丰富的经济实践,积累了博大深邃的经济思想,形成了独特深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文化。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代代中华儿女日复一日的经济活动中表达呈现、传承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实质、组成内容和长期影响的学术研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展开。

基于本文的发现,我们尝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对传统商业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对有代表性的商业文化遗迹,如知名商业家族故居、近代民族工业旧址,不仅应该强调其建筑学上的艺术价值和历史遗迹的价值,还应更加注重其作为传统商业文化向当今世人呈现的文化遗产价值;系统性地抢救、整理我国古代和近代的现有存世商业文书资料,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使传统商业文化资源在生产方式、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等维度上“活”起来,准确生动地展示于众。第二,加强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学术研究,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同组分的研究中,商业文化所受到的学术关注度与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影响的重要性高度不对等,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研究成果为例,主题为“传统文化”的相关研究多达25万篇,而主题为“传统商业文化”的相关研究不足600篇,这是一个亟待发展的研究方向。第三,加强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宣传教育,将以地区商业史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教育纳入各教育阶段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体系中,这有助于在基础教育中更全面地厚植文化自信、建立民族自豪感、激发年轻人的创新创业热情,同时在大学商学教育中传授具有中国特色、根植中国文化、服务中国社会的商业思想和管理知识。第四,加强对传统商业文化的传承发扬,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海内外相继成立了大量的商会、行业协会等地域性商团组织,在当代商团组织治理与发展中,应注意吸纳传统商业文化在家国情怀、社会担当、内部治理、信息优化、合作引导和信誉建设等方面的有益内容;结合传统商业文化和当代中国实际,发展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市场环境优化的当代商业文化,进一步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

表 13 行业传统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	行业集中度(营业收入)			行业集中度(资产总计)		
	2SLS	GMM	PSM	2SLS	GMM	PSM
回归策略						
明清商帮	-0.0721** (0.0293)	-0.0896** (0.0436)	-0.0118** (0.0638)	-0.0857*** (0.0319)	-0.124** (0.0569)	-0.00976 (0.006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18660	18660	8648	18660	18660	8648

注: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发展积累文化实力。

(作者单位:刘蓝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吴琦,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02版)。

②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02版)。

③本文定义一个县有明清商帮兴起和活跃的标准为:1368~1911年间出现了在异府创建的该县商人的商业会馆,或者史料记载该县经商风俗浓厚且有商帮活跃。明清商帮的贸易可以是跨省、跨府和跨县,为了尽量囊括中小商帮,减小仅录入知名商帮所产生的“幸存者效应”,选取异府作为判断标准。采用商业会馆和经商风俗相结合的定义方式,是考虑到史料记载零散和会馆年久失修、日渐消逝可能带来的遗漏。可参见:吴琦、周黎安、刘蓝予:《地方宗族与明清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9~158页。

④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国时空”(CITAS)数据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中国地图数据库、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以及Lex Berman(2005)编辑的CHGIS版统计变量地图。基于ArcGIS软件手工计算。

⑤数据样本所剔除的省份分别为:东北三省明代分属北元、后金政权辖区,清代大多数时期处于保护“龙兴之地”的真空封禁状态,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准颁布《招垦章程》,其他省份向东北的人口流动合法化(杨俊海,2008);内蒙古在明代属于北元、后金及蒙古部落管辖,清代基于“册封达尔罕制度”由政府授权蒙古贵族管辖(齐光,2013);新疆明代属察合台汗国管辖,清代的大部分时期处于“伊犁将军+甘肃布政使司所辖镇西府+天山南路世袭伯克”的混合管理模式,直至清光绪十年(1884)才设立甘肃新疆行省;西藏和青海在明清时期实行“土流参治”、“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社会形态也与内地各省明显相异(林涓,2004)。

⑥对应的当代省级行政区分别是中国台湾地区、重庆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⑦包括地级市、直辖市的市辖区,以1990年的行政区划为基准。

⑧“冲、繁、疲、难”制度于雍正六年(1728)在广西布政使金拱的建议下开始实施,是一种地区治理特征评价制度,对州县治理环境通过地理区位、日常政务、财税条件和治安状况4个维度进行描述。其中“冲”指地处要冲,“繁”指政务冗繁,“疲”指财税疲弱,“难”指盗犯难治。

⑨模型设定在基础回归中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特别是在工具变量个数多于核心解释变量的情况下,两阶段(2SLS)回归萨根检验(Sargan Test)的P值=0.128,广义距(GMM)回归汉森检验(Hansen Test)的P值=0.1006,通过过度识别检验。

⑩数据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数据的统计连贯性较好,但就业结构信息仅含2013年一年的观测。

⑪本文回归中对地区固定效应均控制到省一级,原因在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明清商帮”是县级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而无法控制县级地区固定效应,否则存在完全共线性问题;如果控制地级市的地区固定效应,样本中同一地级市聚类内部,平均只有6个县,核心解释变量的区分度过小,无法准确估计影响系数。

⑫将识字定义为:在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问卷中,受教育程度一栏信息高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水平。

⑬明清史料中对知名商人、商业家族教育观念的记述,是体现传统商业文化与人力资本积累意愿之间关系的一类典型文献例证。“儒风独茂”不仅出现于徽商群体,而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普遍特点。例如:汀州闽商邹氏家族的《家训》记载,“继自今为父兄者,必嬉嬉于童稚中,择其不甚顽钝者,束之于堂塾,聘名师,招益友,俾之磨砢砥砺,相与以有成……知书识字智人,纵置身农工商贾之途,亦有儒者气象,庶不辱我诗书礼义之乡”;宝安粤商林彦愈教育子弟,“汝学能有立,吾啜粥饮水,死不恨矣”;蒲州晋商任氏家族“所好者翰墨”与缙绅交往“凡有所往,必为诗以华之”(张明富,2002;陈支平,2009)。此外,我国近代的外语教育、农技教育、工商职业教育都兴起于商业活动繁荣的地区,这些新式学校创办的背后往往有地域性商团组织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力支持,例如:锡商“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宁波定海中学和定海女子中学,甬商谢衢樾在宁波镇海创办的求精国民小学、金芝山创办的镇东国民学校,晋商杜渐汉创办的杨兴镇女子学校,天津彭城镇商务分会创办的彭城初等学堂,秦皇岛商会创办的实业补习学堂,由通商张蹇发起成立的旨在推动民间兴学的江苏学务总会等(李忠,2005;赵军,2014;戴鞍钢,2018)。

⑭中国家庭跟踪调查(GFPS 2010)为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与明清商帮数据匹配后,仅包括74个县。如果进一步控制省级的地区固定效应,在每一个省的聚类内平均只有3~4个县,核心解释变量“明清商帮”的区分度则过低,因此对社会保险的机制检验不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⑮史料表明,明清商帮组织内部的成员往往分布在一个行业门类中的子行业领域以及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中(如苏州的丝绸商人群体分别分布在桑林、生丝、织机租售、织丝、贸易以及相关金融服务的行业领域中),通过更加有序化的行业组织实现对内部过度集中竞争的规避,并强化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市场中的竞争力(张海瀛、张海鹏,1993;范金民,1999,2006)。

⑯将行业门类定义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GBT 4754-2002》国家标准中被规定为字母代码的行业划分,共17类。在数据处理中剔除了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类、国际组织类以及农林牧渔业类。

⑰国家标准中以三位数行业代码所编码定义的子行业。

⑱行业分布的赫芬达尔指数为子行业营业收入在行业门类加总营业收入中占比的平方和。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hhi_{i,j} = \sum_{n=1}^N (x_n / \sum_{n=1}^N x_n)^2$$

其中, i 代表地区, j 代表行业门类, n 代表子行业类别。赫芬达尔指数越大,说明再一个行业门类中子行业的集中度越高,也就是越多的民营企业集中在少数领域中。

⑲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仅报告估计系数显著的行业门类分组,下同。

⑩明清商帮作为一个不随时间改变的哑变量,除了商业文化之外可能还蕴含历史教育水平的信息,其所反映出来的长期经济影响,就有可能是一种商业文化和教育基础的“复合效应”。教育水平的历史基础如果在当代有所体现,应该体现在识字率上,选取1982年人口普查的识字率信息,对1997~2013年各地的初始教育基础进行了控制。商帮的主效应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商帮和识字率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在考虑了教育基础的影响后,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依然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传统商业文化、教育基础对经济发展的两种拉动作用具有替代关系。

⑪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由民国时期“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实施,调查对象为我国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厂。现有数据包括94个城市,经过与明清商帮数据的匹配,共获得82个观测样本。

⑫因为数据的约束,对于居民创业机制分析中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仍然存在局限,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有待于在后续研究中进行弥补。

参考文献

(1)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2)蔡莉、单标安:《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

(3)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4)陈学文:《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发展的新格局——以衢州的造纸业和木植业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5)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6)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

(7)戴鞍钢:《近代上海与江南传统经济、文化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8)戴亦一、肖金利、潘越:《“乡音”能否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9)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0)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1)冯尔康:《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2)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

(13)高超、黄玖立、李坤望:《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14)高红霞:《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5)辜胜阻、郑凌云、张昭华:《区域经济文化对创新模式影响的比较分析——以硅谷和温州为例》,《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4期。

(16)古志辉:《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17)贺三宝:《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18)李加林、姜忆涓:《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教育捐赠动因及特点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19)李忠:《商会与中国近代教育研究》,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20)厉以宁:《文化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8年。

(21)林涓:《清代行政区划变迁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

(22)罗杨焱:《大理下关商会的组织变迁和金融职能研究(1937~1949)》,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23)骆桂花、肖明远:《一个蜂窝的诞生——西宁城东二手车商帮的人类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24)茅锐:《产业集聚和企业的融资约束》,《管理世界》,2015年第2期。

(25)齐光:《清朝时期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扎萨克王爷的属众统治》,《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26)阮荣平、郑凤田、刘力:《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27)邵传林、金立民:《商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了中国式制度变迁?》,《经济科学》,2015年第1期。

(28)邵传林:《中国商业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传承机理与实证检验》,《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29)王振忠:《从徽州到江南: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30)韦森:《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国—印度经济比较的理论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4期。

(3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

(32)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3)吴琦、周黎安、刘蓝予:《地方宗族与明清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34)徐德金:《跨越40年:闽商创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

(35)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2015年第2期。

(36)杨俊海:《清末民初东北移民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基于招垦章程的分析》,《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22期。

(37)叶德珠、师树兴:《文化与经济增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8)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

(39)张明富:《“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0)张正明:《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

(41)赵军:《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发展的考察》,东华大学,2014年。

(42)赵子乐、林建浩:《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43) Amin, A., 1999,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3(2), pp.365~378.

(44) Banerjee, A. and Iyer L., 2005,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 pp.1190~1213.

(45) Becker, S. O. and Woessmann, L., 2009,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2), pp.531~596.

(46) Berman, M. L., 2005, "Boundaries or Networks in Historical GIS: Concepts of Measuring Space and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33, pp.118~133.

(47) Beugelsdijk, Sjoerd, Ton van Schaik,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Growth in European Regions: An Empirical Tes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1(2), pp.301~324.

(48) Camagni, R., Capello, R. and Nijkamp, P., 2009, "Territor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Reg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ories*, pp.118~132.

(49) Chen, T., Kung, J. K. and Ma, C., 2020,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Economic Journal*, 130(631), pp.2030~2064.

(50) De la Croix D., Doepke, M. and Mokyr, J., 2018,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1), pp.1~70.

(51) Epstein, S. R., 1998, "Craft Guilds, Apprenticeship,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pp.684~713.

(52)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53) Greif, A.,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4) Guiso, L., Sapienza, P. and Zingales, L., 2004,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3), pp.526~556.

(55) Guiso, L., Sapienza, P. and Zingales, L., 2008, "Social Capital as Good Cultur",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2~3), pp.295~320.

(56) Guiso, L., Sapienza, P. and Zingales, L., 2015, "The Value of Corporate Cul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7(1), pp.60~76.

(57) Hickson, C. R. and Thompson, E. A., 1991, "A New Theory of Guilds and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8(2), pp.127~168.

(58) Nunn, N. and Wantchekon, L., 2011,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pp.3221~52.

(59) Stiglitz, J. E., 2000,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pp.59~68.

(60) Waldinger, M., 2017, "The Long-run Effects of Missionary Orders in Mexi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7, pp.355~378.

(61) Zhang, C., 2020, "Cl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8(1), pp.100~123.

附录

表 A 商帮历史对企业兴办长期影响的事件研究法回归结果

变量名	(1)	(2)	(3)	(4)	(续左侧) 变量名	(1)	(2)	(3)	(4)
	企业兴办数量					企业兴办数量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商帮×1949~1950年	-1.929* (1.150)	-0.00861 (0.100)	0.767 (0.928)	0.0677 (0.101)	商帮×1985~1986年	-3.020*** (0.889)	0.0273 (0.0608)	0.686 (0.695)	0.0940 (0.0599)
商帮×1951~1952年	-3.380*** (1.061)	-0.0890* (0.0466)	0.328 (0.798)	0.000226 (0.0468)	商帮×1987~1988年	-2.890*** (0.876)	0.0878* (0.0471)	0.767 (0.690)	0.124*** (0.0476)
商帮×1953~1954年	-3.606*** (1.005)	-0.0785 (0.0549)	0.251 (0.766)	0.00284 (0.0577)	商帮×1989~1990年	-1.403* (0.852)	0.271*** (0.0842)	1.686** (0.716)	0.194*** (0.0836)
商帮×1955~1956年	-3.656*** (0.984)	0.116 (0.0783)	0.282 (0.756)	0.161** (0.0771)	商帮×1991~1992年	-0.549 (0.766)	0.291*** (0.0805)	2.020*** (0.685)	0.189*** (0.0874)
商帮×1957~1958年	-4.001*** (0.982)	-0.0748* (0.0444)	0.0884 (0.740)	-0.0216 (0.0464)	商帮×1993~1994年	2.396*** (0.921)	0.421*** (0.0961)	3.463*** (0.874)	0.270*** (0.0951)
商帮×1959~1960年	-4.133*** (0.993)	-0.0560 (0.0357)	0.0881 (0.745)	0.00312 (0.0381)	商帮×1995~1996年	4.170*** (1.229)	0.261*** (0.0663)	4.328*** (1.198)	0.201*** (0.0672)
商帮×1961~1962年	-4.213*** (0.992)	-0.155*** (0.0298)	0.0264 (0.744)	-0.0812*** (0.0310)	商帮×1997~1998年	6.869*** (1.687)	0.307*** (0.0849)	5.027*** (1.742)	0.223*** (0.0895)
商帮×1963~1964年	-4.166*** (0.991)	-0.0671** (0.0310)	0.0700 (0.743)	0.0244 (0.0317)	商帮×1999~2000年	13.91*** (2.901)	0.557*** (0.113)	7.472*** (2.729)	0.347*** (0.118)
商帮×1965~1966年	-4.057*** (0.985)	-0.129*** (0.0312)	0.167 (0.741)	-0.0528* (0.0320)	商帮×2001~2002年	24.30*** (5.223)	0.418*** (0.110)	11.29** (4.775)	0.216* (0.118)
商帮×1967~1968年	-4.221*** (0.987)	-0.0810*** (0.0272)	0.00621 (0.741)	0.0178 (0.0273)	商帮×2003~2004年	35.06*** (7.380)	0.367*** (0.123)	17.12** (6.646)	0.180 (0.132)
商帮×1969~1970年	-3.990*** (0.996)	-0.0676* (0.0376)	0.203 (0.758)	0.0198 (0.0375)	商帮×2005~2006年	43.45*** (9.516)	0.436*** (0.135)	20.82** (8.596)	0.260* (0.147)
商帮×1971~1972年	-4.158*** (0.982)	-0.0474 (0.0361)	-0.00429 (0.740)	0.0526 (0.0359)	商帮×2007~2008年	40.74*** (10.07)	0.250** (0.107)	18.52** (9.207)	0.119 (0.108)
控制变量×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样本	75207	75207	75207	75207	观测样本	75207	75207	75207	75207

注:表中报告了聚类到县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Long-term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Culture: Evidence from Ming-Qing Guilds

Liu Lanyu^a, Zhou Li-an^b and Wu Qi^c

(a. Peiking University; b.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iking University;
c.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ummary: In the past decades economists have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culture in shaping long-term economic performance. While there is a large literature in exploring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ultural beliefs, social trust, religion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e.g., slave trade and colonial system),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business culture—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ulture which bears most closely with contemporary business operation and practices. China provides a unique context for this exploration since it witnessed a long history of regional merchant groups and guilds, especiall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has numerous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local gazetteers documenting the activity of regional guild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exploits the regional data of Ming-Qing guilds to present systematic evidence for the long-term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itional business culture.

This study draws the data of Ming-Qing guilds from our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collects the county-level data of guilds during Ming-Qing dynasties from multiple sources, such as local gazetteers,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historians' writings. We then combine this dataset with China's population censuses, economic censuses, and contemporary reg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ounties with active guild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hieve better contemporary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per capita GDP and industrial output. We then go further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long term impacts of historical guilds. We find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se regions with stronger presence of Ming-Qing guilds contemporarily tend to have mor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igher human capital level, higher social capital level, more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larger paid-in capital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e also find that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the guilds-active counties had no advantage in establish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ver those guilds-inactive counties, but the former encouraged more entry of township-and-village enterprises into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is implies that the impacts of business culture exemplified by Ming-Qing guilds are mainly played out in the grass-roots level of Chinese society (e.g., village leaders and farmers) rather in the higher-level bureaucracy. This argument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our empirical results that after the South Talk of Deng Xiaoping in 1992, the guild-active counties experienced a much more vibrant entr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an those guild-inactive countie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studies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establish the important link between China's traditional business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focuses on the role of generic culture and social capital in shaping economic outcomes, very few studies look at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business culture. While there is a large literature among Chinese scholars discussing China's Ming-Qing guilds a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s, the absolute majority of them are descriptive in nature and there is no data-based analysis of their long term economic consequences. We also provide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potential mechanism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enabling role of business 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ur analysis helps shed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roots of China's growth miracle in the past decades, increase our confidenc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reevaluating and leveraging Chinese business traditions in a more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Keywords: business culture; guilds; non-state economy; entrepreneurship; human capital

JEL Classification: Z10, C13, N75